

宋初雲門宗的崛起和“活句”的思想¹

土屋太祐（新潟大學經濟科學部准教授）

1 前言

唐末福建禪僧雪峰義存（822-908），曾在洞山良价、德山宣鑑等禪師下修行。後於 866 年回到福州，並在福州郊外雪峰山上創建新教團。此教團的勢力在南方割據政權王閩的庇護下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此後，作為雪峰法嗣的玄沙師備（835-908），以及他的後代漸趨獨立，最終分立出了法眼宗。法眼宗在南唐及吳越的庇護下得到了繁榮。與此同時，雪峰的另一位法嗣雲門文偃（864-949）則在南漢的支持下，在廣東形成了雲門宗。

960 年宋朝成立後，唐末五代的分裂狀態逐步走向終結。到 970 年代，與法眼宗關係甚深的南唐、吳越兩國滅亡，法眼宗的重要人物天台德韶、永明延壽兩位禪師亦相繼離世，從此圍繞禪宗的局勢大變，禪宗也開始逐漸形成了與唐五代不同的宋代特色。本報告著眼於宋初禪宗主流從法眼宗到雲門宗的交替，以及在此過程中雲門宗的語言思想所發揮的作用，並以此來探討宋代禪宗的特點。

2 雲門宗與“活句”

2.1 大慧宗杲與朱熹的禪宗史觀

宋初時，法眼宗在南唐、吳越的舊領土上繼續保持著較大勢力，仍然可以說是禪門主流，但以後的禪學思潮漸漸發生了變化。四卷本《大慧普說》卷一《淨恭園頭請普說》²以及《朱子語類》卷一二六《釋氏》³中的記載皆可為其佐證。

¹ 筆者受到漢學獎助金的資助，自 2022 年 6 月至 9 月在台灣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回國後，在 2023 年 1 月 28、29 日舉行的京都 FORUM “作為世界哲學的禪佛教” 研討會上進行了學術報告，因報告內容包含了訪台期間的研究成果，故將此內容摘要作為訪台期間的研究報告提交於漢學研究中心。另，本報告為未定稿，並有今後正式出版的計劃。

²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四卷，170 頁。

³ 3017-3018 頁。參野口善敬等譯註《朱子語類》譯註卷百二十六（上），175-183 頁。

大慧宗杲（1089-1163）與朱熹（1130-1200），一佛一儒，雖然立場不同，但對宋代禪學的發展有著相同的看法。上述記載表示，當時法眼宗的思想一般被認為注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佛學理論，但正因如此，其思想也存在著“有理路，落窠臼”，缺乏靈活性的問題。然而這種對理論的執著，可以用“麻三斤”、“乾屎橛”等自由的語言來克服，而這種自由語言就是大慧宗杲“看話禪”的特點。可見他們認為，宋代禪宗思想從“注重理論的法眼宗”，發展到了“通過自由的語言，追求覺悟的看話禪”。

2. 2 薦福承古與“三玄”

2. 2. 1 “三玄”

關於宋代禪學思想的動態，薦福承古（970-1045）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三玄”理論是更為直接的資料⁴。

“三玄”是用“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三個範疇來對禪學思想進行分類的理論，其形式與判教頗為接近⁵。這個理論的內容大致如下：

體中玄：講述“三界唯心”理論的階段，相當於法眼宗的思想。

句中玄：用無法確定意義的語言來消除對理論的執著的階段。相當於雲門宗、臨濟宗的思想。

玄中玄：拒絕所有語言，保持“沉默”與“無心”的階段。代表承古自身的立場。

法眼宗原本在唐代禪宗史的最後階段才出現，但在承古“三玄”裡它已成為禪學思想體系的出發點，而雲門宗、臨濟宗的思想便被賦予了克服法眼宗思想的功能。

2. 2. 2 承古生平及其嗣法問題

⁴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93-117頁。

⁵ 土屋太祐《教判から看話へ》。

承古，俗姓未詳，西州人，生卒年為 970-1045⁶。先於大光敬玄下出家，後至南嶽福嚴寺良雅會下參禪。一日閱讀雲門《對機》有悟，因此宣布嗣法於雲門文偃⁷。景祐四年（1037），受此時出知饒州的范仲淹所邀，而住饒州薦福寺。

承古事蹟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其對雲門文偃的嗣法。承古雖然自稱繼嗣了雲門之法，但此時距雲門之死已過約一百年，故承古自然沒有直接受過雲門的教導。而這一破格嗣法舉動，實際上隱含了其對當時雲門宗僧人的批評態度。

《古禪師語錄》中承古批評當時最有名聲的四位雲門禪師，即德山緣密、洞山守初、智門師寬、巴陵顥鑑，說他們“只悟得雲門言教，要且不悟道見性”，並特別舉出了巴陵顥鑑的“三轉語”。顥鑑“三轉語”是針對僧人之提問所作的三個回答，即“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碗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佛教祖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顥鑑說：“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⁸承古對此加以批評，認為禪宗真諦不在語言之上，這些禪師只有言說技巧而已。

顥鑑的作風代表了當時雲門宗內部的思想動態，而這一思想傾向正好對應了“句中玄”的內容。

2. 2. 3 慧洪對顥鑑的辯護

慧洪（1071-1128）《禪林僧寶傳》引用了承古的以上言論，但慧洪對他的觀點並不贊同，認為顥鑑的語言是“活句”，因此不應批評。

“活句”是雲門宗語言思想中的關鍵詞。慧洪說明“活句”時說：“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這句話出自洞山守初的語錄⁹。與此同時，承古的主要批評對象也是洞山守初。也就是說，批評者和辯護者都在利用守初的言論來展開自己的討論。

宋初雲門僧人為了避免為理論所束縛，便開始了對自由語言的追求。洞山守初是在此潮流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而“活句”一詞就代表了他的觀點。

⁶ 永井政之《雲門》，205 頁。

⁷ 《禪林僧寶傳》卷十二《薦福古禪師》，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36 頁。

⁸ 《禪林僧寶傳》卷十二《薦福古禪師》，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38 頁。

⁹ 《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古尊宿語要》卷四，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之一，205 頁。

後來這個“活句”思想被援用到了禪宗公案的闡釋之中。宋代公案禪的代表作《碧巖錄》便是一個重要案例。日本學者小川隆認為這個“活句”就是圓悟克勤在《碧巖錄》中闡釋公案時的核心概念¹⁰。宋代臨濟宗禪師通過繼承雲門宗對自由語言的追求而形成了“公案禪”，而這“公案禪”後來又演變為大慧宗杲的“看話禪”。上文所見大慧宗杲和朱熹對禪學發展的理解正反映了這樣的演變過程。反過來看法眼宗，即可知起在宋初便已漸漸開始脫離禪學的潮流。

3 士大夫與文學

3. 1 法眼宗與雲門宗的交替

台灣學者黃庭碩對八世紀到十一世紀禪僧活動地點的分佈做了詳細統計，研究了禪宗諸派的興衰過程。這一俯瞰式研究對我們掌握禪宗的整體情況很有幫助。據黃的研究，入宋以後法眼宗的勢力發生了如下變化¹¹。

宋朝成立後，朝廷雖然對南方禪宗教團加強了管理力度，但尚未直接介入寺院住持的人選，因此宋初法眼宗仍在浙江、江西等南唐、吳越舊地維持著以往的勢力。另一方面，雲門文偃弟子中的一部分人離開廣東，在外地尋找發展空間，其中最為成功者當屬進軍湖南、湖北的幾位禪師¹²。上面承古批評的“具大聲價”的四位禪師都在湖北、湖南出世的事實也能證明此事。因為這些地區都不在法眼宗曾活躍過的南唐、吳越舊領土的範圍之內。

這種情況大約在 1030 年代至 40 年代之間發生了變化。我們能夠觀察到此時雲門宗在浙江、江西等南唐、吳越舊境內，代替法眼宗擴大勢力的多數例證。黃庭碩舉出明州天童寺、明州阿育王寺、廬山棲賢寺，以及雲門宗僧人自寶（978-1054）在洞山、廬山的事蹟等實例，再加上自己的考證，分析了在這個時期雲門僧人的活動。

此期間推動雲門宗崛起的則是士大夫的支持，而在雲門僧人和士大夫的交流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的，便是詩文應酬等文學性活動¹³。以下要具體觀察在雲門宗崛起初期活躍的兩位禪師。

¹⁰ 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308 頁。

¹¹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321-326 頁。

¹²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253 頁。

¹³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341-344 頁。

3. 2 雪竇重顯

在雲門宗的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是雪竇重顯（980-1052），重顯，遂州（現四川遂寧市）人，俗姓李，法嗣智門光祚。先在翠峰山出世，後來受到明州知州事曾會的推薦住持雪竇山資聖寺。

關於重顯活動的時間，後來的臨濟宗僧人心聞曇賁（生卒年未詳）說：“天禧間（1017-1022）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¹⁴。曇賁大約活動在兩宋之際，可知這條資料較為晚出，但曇賁所言和上文所見黃庭碩的考證並無矛盾，可見在雲門宗擴大勢力的前夕，重顯已經開始受到了矚目。

正如曇賁所說，重顯的活動對當時的禪學潮流產生了重大影響。重顯《頌古百則》在禪林大為流行，後來臨濟僧人圓悟克勤（1063-1135）對此加以評唱，其記錄最終被編為公案禪的經典作品《碧巖錄》。如果將這個作品的風格與法眼宗的思想進行對比，則可知其“宗風”確實有了極大的變化。

以上所見雲門僧人的發展模式，與唐末五代的禪宗截然不同。過去，如雪峰教團與閩國、法眼文益與南唐、天台德韶與吳越等，與地方割據政權的特殊關係為當地禪宗集團帶來了壟斷式發展的機會，宋初法眼宗就是這種勢力的殘餘。但宋朝統一中國後，這種發展就無法複製。在宋代的政治、文化領域中，士大夫官僚才是核心力量，對禪院住持人事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禪宗集團能否發展就完全取決於士大夫的支持與否。能文善墨的重顯通過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進而在法眼宗的勢力範圍掌握了發展的契機，這可謂是一件富有宋代特色的事例¹⁵。

3. 3 洞山曉聰與“活句”

在江西的雲門宗先驅洞山曉聰（？-1030）也以與士大夫的交流，以及善於“雲門宗式語言”而聞名。《禪林僧寶傳》卷十一《洞山聰禪師》云：“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婆娑從旁來，眾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眾目笑之。蓮花峯祥庵

¹⁴ 《禪林寶訓》卷四，《大正藏》第48卷，1036頁中。

¹⁵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327頁，342-343頁。

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 曉聰後來在洞山出世，果然繼承了雲門宗文殊應真之法¹⁶。

對此，作者慧洪在此傳《贊》中，先稱讚蓮花峯祥庵主通過兩句話就知道曉聰是雲門僧人的慧眼，再介紹慧洪閱讀曉聰語錄的經驗，說他的語言“皆赴來機，而意在句語之外。”此處慧洪所說的“皆赴來機”一句，在他辯護巴陵顯鑑“三轉語”時也曾用過，可見慧洪欣賞的還是“雲門式語言”。

後來士人許式走過蓮花峰時，祥庵主勸說許式訪問曉聰。因此許式到任後，便把自己的詩文送給了曉聰。曉聰的自由語言受到很高的評價，並且使用詩文和士大夫進行交流，這一事例也呈現了宋代禪宗的特色。

4 小結

皇祐元年（1049），在東京開封創建禪寺十方淨因院¹⁷。據《佛祖統紀》記載，此前開封只有義理學，而沒有禪宗。翌年，雲門宗僧人懷璉被招為住持（黃庭碩將此事件評價為在開封流行禪宗的先河¹⁸）。關於懷璉，蘇軾在《宸奎閣碑》中說：“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¹⁹

這段話反映了士大夫在佛教思想上的喜好與期待。據《佛祖統紀》，這裡所謂“北方之為佛者”當指義理學僧人，但如果返觀禪宗內部，就可了解被認為是講述“三界唯心”道理、有義理學傾向的法眼宗已經開始偏離士大夫的喜好。與佛教義理學中的複雜議論相比，宋代士人更喜歡與自己的文化習慣相近的詩文，以及與中國本土思想有共通點的話題。

雲門宗僧人，一方面作為禪僧，用“活句”的思想來改變禪宗的語言觀，另一方面，通過詩文應酬與士大夫展開交流，來擴大自身勢力。“活句”與詩文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兩者的關係自然應當慎重討論，但可肯定雲門宗有著在語言上下功夫的特徵，而這一特徵應當來自於雲門宗宗祖雲門文偃本人²⁰。雲門宗的語言觀改變了禪宗的語言，這一潮流最終催生出了公案禪、文字禪，以及看話禪。

¹⁶ 《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33頁。

¹⁷ 《佛祖統紀》卷四十五，《大正藏》第45卷，412頁中。

¹⁸ 《禪運與世緣》，292頁，348-351頁。

¹⁹ 《蘇軾全集校注》，1821頁。

²⁰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120-124頁。

黃庭碩指出，我們能夠看到的最後的法眼宗僧人是《建中靖國續燈錄》卷二六中所收錄的四位，黃由此推測，法眼宗法系應該在《建中靖國續燈錄》成書的十二世紀初以後，最晚在十二世紀中葉以前斷絕²¹。但我們不能認為，法眼宗在禪學思想上的貢獻從此掃地而盡。由薦福承古的“三玄”理論可見，法眼宗的思想成為了宋代禪宗新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永明延壽《宗鏡錄》在宋代再度流行，而對此作出關鍵性貢獻的也是雲門僧人慧林宗本。這一點也證明了法眼宗對宋代禪學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宗本要等到熙寧年間（1068-1077）才“重新發現”《宗鏡錄》²²，之前該書在禪林中曾經一度被遺忘，因此我們也不能否定，五代的法眼宗和宋代的雲門宗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個斷層。

參考書目

原典類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禪林僧寶傳》，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京都：林川書店，2000年。

《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四卷本《大慧普說》，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四卷，京都：臨川書店，2000年。

《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古尊宿語要》卷四，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之一，京都：中文出版社，1973年。

論文、著作類

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中国禅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8年。

土屋太祐《教判から看話へ》，末木文美士監修，榎本涉、龜山隆彦、米田真理子編《中世禅の知》，京都：臨川書店，2021年。

永井政之《雲門—立て前と本音のはざまに生きる》，京都：臨川書店、2008年。

野口善敬、廣田宗玄、本多道隆、森宏之譯註《『朱子語類』訳注 卷百二十六》（上），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

²¹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340頁注175。

²² 柳幹康《永明延壽と『宗鏡録』の研究》，257頁。

柳幹康《永明延寿と『宗鏡録』の研究——心による中国仏教の再編》，京都：法蔵館，2015年。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唐宋世變下的禪宗及其展開（740-1100）》，台灣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

附記：本研究受到了2022年度漢學獎助金、JSPS科研費22K00054的資助。